

2023 年中国欧洲学会年会“变化世界中的欧洲”研讨会综述

胡孝佳 迪丽阿热·安外尔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中国欧洲学会年会于2023年10月20—21日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欧洲学会、南京大学主办,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金陵,以“变化世界中的欧洲”为题,探讨百年变局下的欧洲转型与中欧关系发展。

会上,专家学者对变化世界中的欧洲面临的困境与欧洲的未来进行了深入研讨,对欧洲政治、经济、外交、能源等形势做出研判,并就推进中欧关系稳定发展、推动双边交流提出建设性意见。现将本次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 开幕式及大会发言

在开幕式致辞环节,中国欧洲学会会长冯仲平研究员首先向参加年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当今世界大国竞争日益加剧,欧盟在此背景下增强了自主意识、竞争意

识和保护意识,通过绿色转型、数字转型等制度建设适应新的扩容目标。欧洲自主的本质是欧洲认识到自身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存在差异,因而不盲目追随和过分依赖其他国家。当前中欧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中欧政治关系对经济关系产生了较大影响,欧洲所谓的对华“去风险”反映出欧洲的中国观已经发生改变,欧洲对中国的竞争和对抗是否占据中欧关系的主流,是中欧关系面临的最大挑战。

中国欧洲学会名誉会长伍贻康研究员回顾了自己从事欧洲问题研究、创建国内第一个欧洲共同体研究室、最早同欧共体建立学术交流的经历。他指出,学界曾一度把经济一体化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基础,而如今的国际形势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政治安全和制度建设是否是欧洲一体化的基础。伍贻康研究员强调,欧洲一体化进程在20世纪60—90年代持续推进,而当今欧洲呈现出一定的脆弱性,欧盟的模式和制度可能遭遇新的转折点,新的模式还在探索当中,巴以冲突可能给欧洲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深刻影响。

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陈冬华首先介绍了南京大学欧洲研究的基本情况。他指出,南京大学的欧洲研究总体呈现出以英国研究见长、英法德俄研究协调发展的特点。随后,陈冬华处长强调,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时代,美西方单边扩张主义正在给欧洲乃至世界制造诸多问题。专家们从多视角探讨欧洲重大问题,有助于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服务于国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事业。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教授援引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先辈王绳祖先生的话,指出对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研究是因为欧洲在世界舞台上占据显要位置。欧洲研究的文献资料纷繁,但是不能简单堆砌,对于那些特别重要的、能够说明欧洲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史料,必须加以收集。他认为,如何定义欧洲对于国内欧洲研究学界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对于如何从中国的视角看待欧洲、研究欧洲具有深刻意义。

随后,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曹蕾、商务部欧洲司四处处长王昊先后发表主旨演讲。曹蕾副司长向与会学者介绍了近期中欧关系的发展形势,强调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对欧工作,并对欧洲研究学界提出期待:第一,保持前瞻性,坚持问题导向,增强政治站位,立足国家本位,保持国情定位,用发展的眼光、战略思维深入研究;第二,增强主动性,在对欧思想交流中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阐述好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第三,加强对欧洲的基础性研究,特

别是中小国家和冷门领域,依托基础性资料、数据、素材的长期积累提炼总结规律性认识;第四,加强政府、学界、商界、民间、地方等的协同合作,积极参与新时代中欧关系的发展,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

在大会发言环节,徐明棋研究员围绕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职能转型,提出欧债危机后欧洲央行的职能不断扩充,不仅成为欧盟金融政策的重要监管者,还被赋予维护落实欧盟经济政策目标的重要职能。欧盟面临新冠疫情和经济危机冲击时,欧洲央行职能的拓展为欧盟克服危机和推动经济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未来,当德国经济恢复正常增长后,恢复财政纪律和保持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中性的诉求将会重现,欧盟在一体化机制上的矛盾也会再次显现。

丁纯教授回顾了“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经历的“相对冷淡”“相对积极”和“竞争并存”三个阶段及其各时期在欧洲取得的主要成就和面临的挑战,剖析了中欧产业竞争、经贸与地缘政治问题,以及美国因素等的影响。他依据实证研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贸易、投资、基础设施等机制和渠道提高了欧洲经济发展与民生水平等,并驳斥了市场开放性不足、“债务陷阱”等不实指责。然而,欧洲民众对华印象并未显著改善,民心相通任重道远。

邓翔教授围绕大变局下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调整方向,认为受俄乌冲突、能源危机和地缘政治变局的冲击,欧盟不得不从理想主义调整为现实主义,环境立法的节奏放缓,产业政策调整也陷入讨价还价之中。

吴志成教授指出,当下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俄乌冲突的持续与核威慑的风险强化了北约的内部凝聚力与对外扩张职能。这威胁着全球的安全格局,全球信任赤字加重。欧洲“战略自主”的美好愿望与依赖美国的现实,将导致一个欲立难立、不断分裂的欧盟。在地缘政治和安全博弈回归的背景下,欧盟通过增强地缘政治影响力来应对大国竞争,从防务安全、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等方面提升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维护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全球行为体地位。

崔洪建教授指出,对于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演变的现状,欧盟的认知经历了从主动拒绝到被动接受的过程,在行动上则体现出从被动反应到主动应对的变化。在上述变化过程中,欧洲逐步确立了自己作为地缘经济力量、地缘政治实体和规则变革主导者的三位一体角色,但由于这三重角色在现实中存在尖锐矛盾,欧洲看似系统性的战略设计实际上存在战略对冲的问题,加之欧洲自身的复杂性和短期内难以改变的权力结构,决定了危机管理而非战略远见仍将是欧洲在多极化格局中的主要应变之道。

二 变化世界中的欧洲政治

作为突发性事件,俄乌冲突延宕至今;与此同时,政党政治与欧洲一体化议题历久弥新。鉴于此,与会学者围绕俄乌冲突、欧洲政党政治的变迁、欧洲一体化与去一体化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此外,欧洲对外政策以及欧洲国家内部的政治变革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

俄乌冲突及其引发的难民潮依旧是与会学

者关注的重点。孔田平研究员指出,“明斯克进程”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俄乌之间缺乏互信,缺乏合作的政治意愿,两国对顿巴斯冲突的认知以及在顿巴斯的目标存在差异。“明斯克进程”的失败使得顿巴斯的局部冲突演化为在乌克兰土地上的全面战争,其直接后果是欧洲安全秩序崩溃,欧洲地缘政治重心东移,短期内看不到走向和平的曙光。王传兴教授认为,就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互动而言,一方面,欧洲的难民政策对欧盟多层次的政治博弈以及涉及欧盟利益和难民治理的国际政治博弈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围绕难民议题的多层次国际政治博弈反过来制约欧盟的难民政策。

与会者还对欧洲政党政治的新趋势进行了深入阐述。林德山教授认为,欧洲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在崛起并冲击欧洲既有政治权力结构的同时,自身也在经历新变化,主要表现为政治思想方面的去极端化和政治行为方面日益展示的“负责任”形象。面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新变化,欧洲主流政党的“不合作”立场正悄然发生改变。贺之杲副研究员指出,目前欧洲正从持续了几十年的政治稳定期走向政治变动期,其政治生态特别是政党格局、政治思潮和政治制度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政党格局来看,政治生态遭遇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持续冲击,中间派政党的地位式微;从政治思潮来看,政治生态呈现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合流、民族主义与欧洲主义竞争等态势;从政治制度来看,政治生态出现欧盟委员会与欧洲议会走近、“德国化”与“中东欧化”拉锯等趋势。玄理博士指出,近年

来欧洲政治右倾化趋势越发显著,主要表现为右翼政府数量增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呈现主流化趋势,传统右翼政党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出现合流趋向,以及青年的政治认同右倾等。这不仅给欧洲一体化进程和202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带来极大变数,还会威胁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挑战中欧关系的多边主义底层逻辑。

诸多学者对欧洲一体化与去一体化问题予以关注。李明明副教授谈及西方国家地区主义政策从“去一体化”到“再一体化”的演变,指出近年来西方国家试图重启地区一体化建设,提出了一些新的区域合作方案,地区主义政策的演变在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和国家层面将产生一系列影响。首先,当前西方国家的地区主义政策并未推动世界的整体发展,而是起到了阻碍作用;其次,当前西方国家的地区主义政策使得东亚、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趋势面临考验;最后,中国成为当前西方国家地区主义政策的重要指涉对象,需要积极应对。王义桅教授认为,欧洲共同体的前提是同质性文化的价值传统,然而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其在包容性和自主性方面存在缺陷,且“共同体方法”难以在全球范围推广;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最广泛、最包容的命运共同体,不仅超越了欧洲共同体的地理边界所导致的负外部性,而且超越了成员国主权让渡—欧盟主权的二元论,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进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是引领人类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和人间正道。张立新教授认为,身份是文化价值观的体现,是对(新)自由主义秩序观、(新)现实主义秩序观和

多元秩序观、社会建构主义秩序观的选择和构建。民族—国家身份的三层状态构成西巴尔干地区秩序的新形态,表现出一体化和碎片化的双向互动特征。陆铭博士认为,不安全感与社会依恋分别对欧洲民众的阴谋论信念产生了正向和负向的显著影响。具有较强阴谋论信念的民众更排斥欧洲一体化和气候变化政策,并且对外来移民的态度更加冷淡。因此,呼吁理性、传播真相、破除谣言、澄清误解不仅是当代欧洲内部治理的“刚需”,也是中国推动大国外交、提升国家形象,以及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欧盟的对外政策、欧美关系引发了参会学者的热议。刘金源教授指出,2021年9月欧盟委员会正式发布的“欧盟印太战略”标志着官方印太战略的正式出台,此后的声明和行动表明其在南海政策上已偏离自2012年以来所秉持的“原则性中立”立场,体现了追随美国、遏制中国以及强化在南海地区军事存在的倾向。因此,中国应未雨绸缪,弱化与对冲欧盟南海政策中遏制中国的因素,降低欧盟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和干涉力度,谋求南海局势的和平与稳定,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赵柯副教授认为,“欧盟是一支什么样的力量”虽然是二十多年前国内外欧洲学界热议的旧问题,但在世界之变的今天仍有新价值。他指出,研判中欧关系的发展方向,首先需要理解21世纪以来欧盟力量性质的转变,当前的欧盟正在从一个经济货币集团转向政治安全集团,更多地从地缘政治而非自由贸易的视角重新审视世界,这是

一个根本性变革。严少华主张从战略文化的视角探讨欧洲“战略自主”,认为目前关于欧洲“战略自主”的讨论是欧洲战略文化讨论的一种延续和拓展,本质上是要为变化世界中的欧盟提供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或思想基础,并提出“战略自主”成为新的欧洲战略文化的可能性。

此外,欧洲国家内部的政治变迁及重要政策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徐晓红博士围绕苏格兰的“国家构建”构想,指出苏格兰政府于2023年7月27日公布的《建设全新的苏格兰:独立苏格兰的公民身份》文件标志着苏格兰分离绕过中央授权步骤、自行进入“国家构建”的议程推进环节,意味着其分离运动由“在主权国家框架内谋求民族构建+推动独立公投”转为采取“先‘国家构建’再谋求中央授权”的曲线救国路线。同园博士围绕两德统一后德国的太空政策,指出太空领域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场所,欧洲也在世界航天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欧洲的领头羊和欧洲航天局的主要成员国,德国是欧洲航天局各类太空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三 变化世界中的欧洲经济与法律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在欧洲日益显现,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亦为欧洲带来机遇与挑战。面对不确定性,中美欧在经济领域的博弈日趋激烈,欧洲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以规制经济运行。与会学者围绕能源危机、数字经济、中美欧的经济博弈、欧洲经济领域立法,以及欧洲劳动力市场、德国经济发展趋势、英印自贸协定等议题展开讨论。

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能源危机愈演愈烈,这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刁莉教授指出,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的剧烈波动使世界认识到,各类导致能源危机爆发的不稳定因素依然会阻碍绿色低碳转型的步伐,这给世界绿色经济的发展造成压力。因此,欧洲投资者应借助市场间的波动相关性进行投资优化,制定多元化的投资战略,环境政策制定者也应把握市场间的长期相关性,制定合理的政策,助力欧洲绿色金融发展与转型。吴贺刚教授指出,俄乌冲突是地缘经济手段的反映。经济因素已成为现代地缘政治冲突中的核心问题,被美西方垄断的金融贸易体系是造成当今发达国家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之间主要矛盾的根源。王皓副教授从欧洲碳市场与电力市场协调发展的角度探究了不同市场状态下的极端风险溢出效应及其时变特征,以及在不同市场状态下溢出效应的不对称性。他认为,合理借鉴能源危机下平衡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的欧洲经验,可以为中国协同推进碳市场建设与电力市场化改革,为市场参与者了解市场信息、适时调整相关决策,以及为政策制定者与市场监管者监测与防范能源市场的尾部风险、提升能源应变能力提供依据。李倩瑗副教授认为,新冠疫情暴发和俄乌冲突以来,欧盟的矿产资源治理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主要包括供应链中断、价格波动和能源安全。鉴于此,欧盟进行了战略思维和政策选择方面的较大调整,欧洲的能源政策和矿产资源治理展示了一种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数字经济是近几年热议的话题,自然也得

到与会学者的关注。林力副教授指出,中欧在通信技术关键领域、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数据安全、技术标准与市场监管方面优势互补,均以领跑数字经济、打造安全市场环境、摆脱美国数字霸权为共同目标,因此可以降低贸易的交易成本,实现共赢。然而,数字经济融入中欧贸易的过程中存在欧洲保护主义、数字技术政治化、美国战略牵制、中国企业缺乏对欧投资动力的阻碍。王功博士指出,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对俄经济制裁增加,地缘政治风险大幅上升,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了潜在影响。财政与货币政策相协调以及绿色转型、ESG与数字化转型的共同作用推动了欧元再国际化的进程。然而,欧元区经济发展将始终制约欧元的国际化进程,同时欧元的政治化趋势也阻碍了欧元的再国际化进程。

与会学者还对中美欧在经济领域的博弈予以关注。忻华研究员认为,在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战略和欧洲“双层四方”的经济安全战略架构的背景下,欧洲政治精英采用“去风险”的叙事实施“进取型”和“防御型”两种类型的经济安全政策,在科技协作、产业战略、出口管制、投资审查、贸易保护和金融安全等领域建章立制。当前欧洲经济安全战略一方面成为美国“一体两翼”的对华遏制战略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欧洲内部趋于极化的政治生态。程旭坤研究员指出,欧盟“全球门户”计划期望通过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将世界各地的商品、人员和服务对接,本质上是为了维护欧盟在全球的战略利益,是为扩大自身在国

际经济中的影响力而形成的全球互联互通战略。“一带一路”和“全球门户”之间有诸多共识和较大的合作空间,在推行过程中可以进行优势互补。赵健哲博士认为,以美欧技术与贸易委员会为机制性合作平台,以对华先进技术出口限制、涉华先进技术企业投资为重点行动,结合美欧既有的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规范性权威,欧美对华技术政策协调已形成全方位布局。虽然美欧对华技术政策协调将挑战公平开放的国际科技环境,但美欧在对中国的技术安全政策方面仍有明显差异,中国可充分利用中美欧三角关系,缓解来自美欧政策协调的压力。

近年来,欧洲在经济领域加快立法步伐,并对中国造成负面影响。叶斌副研究员认为,欧盟对外经济法在立法目的、规制工具以及法律理念等方面呈现出转型趋势,反映出欧盟的竞争力焦虑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同于美国以实力为基础的对外经济制裁方式,欧盟对外经济法建立在规范性力量的基础之上,在寻求公平竞争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更具合理性,显示了欧盟的“战略自主”,与美国“志同道合”。解楠楠博士认为,欧盟“反经济强制条例”缺乏国际法依据,存在合法性危机和滥用风险,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欧盟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和长臂管辖权。中国可联合非欧盟国家和国际组织向欧盟施加压力;开展舆论反击,推动“经济强制行为”定性、定量化和“反经济强制规则”多边化;持续充实涉外法律工具箱,同步提升中国涉外执法机构的执法能力和水平。

此外,欧洲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趋势,以及欧

洲主要大国的经济发展方向亦吸引了学者的目光。张浚研究员指出,从统计数字看,欧盟劳动力市场表现良好,2023年8月的欧盟失业率是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然而,欧盟的劳动力市场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制约了欧盟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劳动力短缺、技能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以及劳动力成本的增长。胡琨副研究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非洲由于缺乏足够重要的战略意义与现实利益,未能成为德国对外政策的重要议题。然而,在难民危机、能源转型以及“非洲崛起”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德国开始认识到非洲在战略与利益上的重要性,其对非经济政策重心也逐渐转向“价值观一致”的合作伙伴国家,以撬动对非私人投资以及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经济合作。曲兵副研究员指出,英国和印度于2022年1月启动自贸协定谈判,既是世界第五大和第六大经济体的较量,也是老牌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在新时代的博弈。双方既坚守了各自的“红线”,又做出了必要妥协,一旦英印两国达成全面自贸协议,其影响将超越双边和经贸范畴,对亚太乃至全球经贸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较大影响。周旺旺博士指出,当德国政府意识到工业4.0发展过程中数字化程度落后的困境后,便将经济和社会的数字转型列为优先议事日程,工业4.0成为数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数字化发展不均衡、银行贷款与数字化项目融资结构性障碍、融资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以及德国风险投资市场薄弱等问题,依旧是联邦

政府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

四 变化世界中的欧洲外交与安全

外部冲突与内部危机的叠加,使欧洲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出现了大幅度调整。鉴于此,学者围绕欧盟及成员国的外交政策、中欧关系、欧洲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欧美防务合作、北约扩张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俄乌冲突所引发的在欧盟成员国间,以及欧美两国间的双边博弈持续受到学者关注。宋黎磊教授认为,俄乌冲突激化了中东欧地区地缘政治的安全诉求,在对俄态度上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选择与北约保持一致。未来中东欧国家若要成为欧盟的“第三极”,需要回应欧盟老成员国提出的“战略自主”方向性的问题。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对“战略自主”议题相当冷漠。徐瑞珂副教授指出,英国是“热情式追随”,认同美国倡导的“民主与威权”叙事,对华政策价值观色彩更为浓厚,经济技术和安全事务上主动跟进和配合美国;法国属于“叛逆式追随”,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借力欧盟、平衡美中,在经济技术和安全事务上避免对美国亦步亦趋。他认为,英法两国与美关系模式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两国对美国在经济贸易、安全防务方面的依赖程度不同,与美国合作关系的制度化程度不同,对美国霸权的认同程度不同。

在欧盟对外战略方面,邢瑞磊副教授回顾了自2007年12月欧盟签署制度改革的《里斯本条约》到2022年的俄乌冲突历程,指出欧盟的三条演化路径:一是从“宽容共识”到明确的

“核心利益共识”,“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被理解为欧盟的“存在性利益”;二是“战略自主”强调了在欧盟周边地区和世界范围内建立秩序的必要性,特别是与美国、北约和联合国这三个“核心伙伴”的紧密合作;三是将所有具有对外行动能力的机构聚集在一起,并将各自的专属权能与共享权能进行整合。张崇富教授回顾了欧盟宗教外交从“志同道合小组”到欧盟对外行动署的宗教因素的强化,再到“跨大西洋宗教与外交政策网络”论坛的成立,进而设立“促进欧盟以外宗教或信仰自由特使”,指出欧盟通过多轨宗教外交的方式成功将“规范性力量欧洲”的基本叙事扩展到宗教领域。然而,欧盟仍然是基于世俗规则和价值观的,宗教只是建构“规范性力量欧洲”叙事的工具之一。

竞合并存的背景下,中欧关系的发展方向得到了学者的普遍关注。张骥教授指出,当今世界的最显著特征是大国竞争重新回到国际舞台的中心。国际关系呈现出三方面的新变化:一是地缘政治博弈全面展开,中美之间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战略竞争,还是全面的战略竞争;二是逆全球化,主要表现为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相互依赖呈现安全化趋势;三是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因素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党和苹博士认为,欧盟从单一人权价值观转向复合型价值观,后者包括安全、公共秩序、人权、可持续发展、公平竞争和反胁迫。欧洲的“价值链”外交有强烈的经济动因,欧盟将其与自身的安全和繁荣相关联,认为人权、民主和法治等价值观事关欧盟的安全、韧性、稳定和繁荣。赵纪周博

士认为,在美国作为盟主的联盟体系中,英国作为副盟主具有军事实力,在军工联合研发、情报搜集和共享方面与美国关系紧密。在双边或大多边机制中,英国发挥的作用主要有:充当联盟事务的先锋者,在区域层面充当联盟关系的串联者,在双边关系中发挥联盟体系的修复作用。

国际形势云谲波诡,欧美防务合作及北约扩张进程亦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王学玉教授提出关于欧洲安全框架的三个问题:第一,欧洲安全是谁的安全,是欧洲、大西洋的安全,还是亚欧安全体系;第二,如何构建欧洲地区安全,北约、欧盟、欧安组织发挥的主要作用是什么;第三,欧洲安全服务于什么样的目标。他指出,俄乌冲突凸显了欧盟的地缘政治重要性,欧洲安全一体化加速建设,欧洲防务实现再建构,欧盟成员国之间联合采购,军工企业的合作日趋紧密。寿慧生研究员指出,跨大西洋联盟体系面临三大核心挑战:一是北约内部利益分化,美国战略收缩和欧洲战略自主之间存在矛盾;二是英国脱欧使美国失去控制北约和欧洲的抓手;三是土耳其成为麻烦制造者,埃尔多安基于土耳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身外交政策的政治逻辑,热衷于“战略性模糊”外交以实现土耳其的战略目标。然而,信息不对称容易引发冲突,导致美欧—土关系恶化、土俄关系升温,跨大西洋联盟出现危机。杨海峰副研究员认为,欧美安全与防务关系呈现全面深化态势,主要体现在北约峰会达成了安全与防务的战略共识,行政安排夯实了安全与防务的制度框架,军事俄乌展示了安全与防务的行动能力。然而,欧美

安全与防务关系的持续深化受到如下因素的掣肘:欧洲“战略自主”动力不足;美国政党竞争加剧,战略重心和策略方式游离不定;俄乌冲突局势延宕不决,持续援乌的可行性受到挑战。即便如此,欧美安全与防务关系深化之势难以戛然而止。简军波副教授认为,在欧美受到地缘政治竞争对抗的强烈刺激的背景下,双方防务合作将会逐步深化;鉴于结构性挑战的存在,双方合作达到一定限度后便会进入无法继续前进的深水区,并可能诱发双方在安全领域的部分冲突;欧美防务合作宏观上会阻碍南方国家建构新的国际秩序的可能性。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有机会寻求与欧美在防务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在全球治理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机会。汪乾副主任认为,土耳其之所以同意瑞典加入北约,首先是因为,瑞典为满足土耳其的政治和安全诉求持续调整反恐政策,同意与土耳其联合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其次,土耳其以“入约”问题为筹码向美西方要价,在军事上需要从美国、瑞典等西方国家获取先进武器装备以提升军力,在经济上需要美西方为其纾困并推行“埃尔多安经济学”;最后,作为北约成员国和正在申请入盟的土耳其,依然把“西向”作为外交战略的基石,所以不太可能破坏北约北扩的进程。陈艺元博士指出,美国在印太地区“竞赢”中国是美推动北约入亚的现实动力,拉拢盟友对抗第三方是美国维护全球霸权的政策传统,构建打通欧亚的价值观同盟是美推动北约入亚的深层动力。北约东进印太不再是停留在政策层面上的战略设计,北约已经完成印太

地区的前沿部署,同印太伙伴国已经形成机制化合作。

非传统安全问题亦得到了学者的关注。程保志副研究员介绍了欧盟海洋安全战略的实施路径,即扩大多边和双边海洋治理伙伴关系。中国应加强战略层面的沟通与协调,争取在“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上取得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示范性合作成果。同时,欧盟也应真正做到“战略自主”以减轻第三方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杨洋副研究员指出,荷兰构建了以“尽可能开放、必要时保护”为原则的知识安全治理体系,其核心原则是平衡、开放与安全。中国政府与学术部门应提高风险认知与研究,通过推动与西方国家科技交流合作、提升与西方学术部门的联系等举措尽量规避风险点,降低不利影响。

此外,欧盟与其他地区大国的安全合作,以及欧盟重要成员国的安全战略也引发了学者的关注。吕新锋研究员指出,虽然北约设立驻东京联络处被按下了暂停键,但是日本会想方设法促成此事。在美国加紧围堵中国的背景下,特别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日本政界异口同声,扬言“今日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台海”。然而,由于日本实力逐渐衰弱,只能拉帮结派、投靠北约,因此成为美国利用俄乌冲突调动全球盟友力量、遏制中俄的大棋局的重要一环。张杨博士认为,德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政治动因是国际环境中对俄的能源依赖、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以及对美国的军事依赖。这与德国政府推行女性主义外交政策、强调全人类安全、扩大对安

全的理解的民意趋向有关。

五 变化世界中的欧洲社会与文化

大变局时代下中欧竞合并存。一方面,中欧竞争的现实不容回避,双方竞争不断深化。另一方面,中欧双方应在竞争中加强合作,这离不开对欧洲社会文化和中欧文明的深入研究。学者围绕欧洲的社会与文化、欧洲主要大国的社会政策,以及中欧文明互鉴等议题展开讨论。

学者从欧盟规范性力量构建的效用以及欧洲社会文化政策及其政治影响进行阐释。张莉教授认为,虽然中日韩三个国家的媒体关注了不同的欧盟议题,但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规范性力量得到了格外关注。她指出,欧盟规范性力量形象的建构在亚洲虽未完全失败,但并不凸显,该形象在中国和韩国比日本更加清晰。郭灵凤副研究员阐述了通过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国家担当社会秩序的守护人、实现社会团结、加强社会稳定等福利国家职能,认为在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变化、竞争性知识经济兴起的背景下,经济长期增长更多地取决于具有长期回报率的人力资源投资,而非外在的经济环境变动和人口变化。陈昕彤副教授认为,右翼民粹主义在迅速崛起的过程中通过宗教和传统文化建立了广泛的排外认同,在当前欧洲社会政治格局变化的背景下吸引了大量对变革难以适应的社会阶层,其成功的文化叙事策略值得关注与研究。

英法德等大国的社会文化政策亦得到了学者的普遍关注。张金岭研究员认为,2023年伊始,法国政府在时隔三年后再次推出的新退休

制度改革方案遭到民众激烈抵制,折射出法国社会面临的双重危机:一方面是结构性赤字与可持续性危机,现收现付的退休制度面临结构性赤字风险;另一方面是社会不公正危机,体现了政府软弱无力、行政能力低下。马麟贺博士通过分析英国政府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英国民众对乌克兰、俄罗斯、欧盟、北约的态度,并与法国等国民众的态度进行对比,认为英国国民的独特性与“三环外交”“光荣孤立”和岛国心态存在密切联系。徐梓红博士认为,“温莎框架”的达成标志着英欧关于《北爱尔兰议定书》的争端得到妥善解决。然而,部分贸易规则、英国法律“去欧盟化”带来的监管分歧将削弱“温莎框架”的实施效果。这不但会阻碍北爱尔兰经济从脱欧后贸易安排中受益、影响地方治理,还会逐渐重塑北爱尔兰的政治格局,爱尔兰实现统一的可能性将会增加。

中欧竞合以及中欧文明互鉴也是学者讨论的重要议题。高健研究员认为,英法德的现代化道路各异,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内涵与发展进程注定与西方早期工业国家存在根本差异。鉴于中欧的文化认知差异,他提出开放平等的文化心理是文明间和谐共处的主观前提,深厚的历史修养与敏锐的现实体悟是文明间有效沟通的认知条件,行之有效的内外政策是不同国家参与文明间合作交流的基本保障。李丹教授认为,近年来欧盟试图通过构建“中国威胁”的叙事来吸引西巴尔干国家,然而欧盟的这一叙事并未获得西巴尔干国家的共识。“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叙事比欧盟的安全叙事更

契合西巴尔干国家的所需所愿,中欧在互联互通、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公共卫生与文明互鉴等方面可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庄严博士认为,处于世界变局旋涡中的欧盟未能以“欧洲战略自主”有效破局,在叠发危机的冲击下,欧盟在应对多重挑战时不断尝试新策略,但也暴露出其内外治理中的诸多矛盾。欧盟的“去风险”叙事与成员国的举棋不定相互交织,欧洲社会对华话语的态度差异性和离散度加大,中欧角力在多领域向深层次演进。王偲骁副教授指出,中欧人文交流以政府机制为引领,中国同中东欧人文交流成为新亮点,冬奥会促进了民间交往,线下活动卓有成效。他认为,要认识中欧人文交流的历史根基及现实基础,激活政府间合作机制、鼓励民间社会团体加强交流,积极推进中欧智库和高校的合作,拓展新闻传播渠道。严展宇博士归纳了欧洲大陆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谱系,展现并评述了欧洲大陆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成果。他认为,在生命隐喻的视角下,欧洲大陆国际关系学的知识谱系呈现为一个由孕育、新生、童年、流亡、离散、重聚组成的“多幕剧”,共同构成欧洲大陆国际关系学的“生命存在”。

六 变化世界中的中欧关系

中欧关系向来是国内欧洲研究的焦点。学者从多重危机下的中欧关系走向、欧盟对外战略调整、中欧经贸关系等视角对中欧关系进行研判。

诸多学者从政治领域探讨了大变局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张迎红研究员认为,北约对中俄

采取了既有区别又相互关联的政策。在对中俄的定义方面,北约认为俄罗斯是欧洲安全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威胁,中国则是欧洲安全的挑战者和系统性竞争者;在对中俄政策方面,北约对俄罗斯采取“威慑和防御”政策,实施全面制裁和去俄化,对中国则采取“接触和戒备”政策,保持建设性、对等和透明的机制化接触。同时,北约也开始采取将中俄绑定的态度,有意塑造中俄共同破坏国际秩序的叙事场景。杨娜教授指出,俄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盟与主要大国的关系,对中欧关系亦造成影响。拜登政府上台与俄乌冲突的叠加使得美欧之间再次趋近。与此同时,欧中意识形态分歧逐渐扩大,恐干扰中欧经贸关系发展,而欧盟及欧洲主要大国亦可能与中国在印太等地区产生摩擦。然而,中欧关系仍处于一种总体稳定、时有摩擦的正常大国互动状态,在气候变化、绿色经济、人文交流等方面有稳定坚实的互动基础。李杉研究员分析了欧盟对华去风险政策与中美博弈的相关性。他认为,一是欧盟不寻求与中国脱钩,而是希望降低对华贸易风险。然而欧盟缺乏战略,也难以构建有效的政策工具;二是美国在不与欧洲盟友磋商、不顾及欧洲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出台政策的现象日益凸显;三是欧盟对美国越来越深的安全依赖意味着欧洲各国只能在安全问题上“唯华盛顿是瞻”。王朔教授指出,虽然欧洲对华竞争意识不断加强,但也应看到中欧关系仍存在一些内在的稳定性。一是中欧四大伙伴关系仍有一定的根基,欧与美本质仍有不同;二是脱钩断链风险的加大不仅损害中国,

也伤及欧洲;三是政治分化是欧洲内部利益多元化的反映,欧洲对华政策虽然摇摆不定,但并非铁板一块;四是欧洲虽依赖美国,但亦知晓代价。张飏副教授以英中关系走低期为例,通过检视中英双方的贸易、投资、旅游等方面的数据,指出从2016年英国脱欧至今,虽然中英关系陷入低谷,甚至被称为“冷冻期”,但这非但没有影响中英双边经济关系,反而持续向好发展。杨继龙博士指出,过去数年间欧盟所经历的战略调整是一个动态过程,欧盟对华政策出现的安全化转向是欧盟战略调整的组成部分。欧盟的经济安全转向对中欧经贸关系作为“压舱石”的作用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应被低估,“去安全化”也应成为中国对欧战略新思维的重要考量。王鹏研究员认为,中东欧国家是中国开展对欧外交、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然而,近年来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引起部分中东欧国家的效仿跟进,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俄乌冲突的持久化以及中国在该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也被部分美欧反华势力利用以离间中国—中东欧关系。

从经济层面分析中欧关系的调整也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杨逢珉教授指出,自欧元区成立以来,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迅猛增加。欧盟成员国的市场规模、劳动生产率和科技水平等对中国对欧投资起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欧盟成员国的工资水平则对中国对欧直接投资起到负面影响。中国企业对欧盟直接投资表现出明显的市场寻求型投资动机,辅之以战略资产寻

求型和资源寻求型投资动机,仅有少部分企业出于效率寻求型动机而对欧投资。杜莉教授指出,影响中欧金融深度合作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疫情改变了宏观经济环境,多样化投融资模式下的市场参与度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中美政治博弈和中欧竞争加剧给合作带来巨大挑战。她强调,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金融合作应加强顶层设计、共谋发展,培育中国—中东欧国家一体化市场融资体系,建立统一金融监管机制。吴侨玲教授指出,在中欧多层次积极互动交流的背景下,我们应对未来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中欧双方各自的优势使得经贸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将进一步促进中欧经贸合作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中欧经贸合作关系的良性发展将为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因素。刘明礼研究员指出,当前中欧经贸摩擦增多,政治因素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关键因素是欧盟经济不景气、内需不足,中国需做好中欧经贸关系面临长期困难的准备。中欧贸易下滑还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相关,亚太地区的产业链重组给中美、中欧贸易带来不利影响。赖雪仪副教授指出,中欧间贸易依存度持续提升。对于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对华贸易依存度都相对高的国家,中国的贸易及投资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最为积极;对华贸易依存度相对低的欧盟成员国亦能从与中国的贸易及投资中获得积极影响,但同时面临增加国家债务的风险。对于对外贸易依存度相对低而对华贸易依存度高的国家,对中国贸易与其就业率、经济增

长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然而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家债务也是正向关系。因此,中欧共同推动多边国际经贸投资合作才是双方共赢的战略选择。樊文静副教授指出,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构建双循环经济新格局意义重大,而中欧服务贸易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将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整体而言,中欧服务贸易能够显著推动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产出服务化;分行业而言,中欧服务贸易对不同要素密集的制造行业的影响存在差异。

七 闭幕式及大会发言

在大会闭幕式的主旨发言环节,各参会学者从欧盟与北约关系、欧洲转型、欧洲困局、中欧关系、德国女性主义外交等角度展开演讲。郑春荣教授认为,近年来欧洲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欧盟与北约强化协调和互动,双方的互动议题从安全与防务领域延伸至前沿科技领域,覆盖地域从欧洲拓展至印太地区,二者关系的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然而,基于欧盟与北约对欧洲安全的主导权存在竞争、对俄政策共识的持续性存疑以及双方战略重心和威胁认知难以趋同等因素,二者关系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丁一凡教授指出,欧洲在乌克兰危机中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老欧洲与新欧洲对欧洲一体化的认知和期待存在差异,而一票否决制的原则使欧盟的决策更加困难。法德主宰欧洲一体化已成为历史,欧洲“战略自主”已成为泡影,因此我们需清醒地认识欧洲现状,改变一厢情愿的想法和做法,认识到实现中美欧之

间的力量平衡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田德文研究员指出,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局,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趋于表面化,欧盟机构遭到美国严重渗透,“欧洲战略自主”实际上已经“脑死亡”;欧洲继防务依赖美国后,政治和经济的自主性也明显下降;德法等欧洲大国国内矛盾重重,维护国家利益的勇气和能力持续下降。欧洲能够走出困局的关键变量是美国的立场,但是并不意味着欧洲国家都同样甘于沦为美国的附庸,法德等欧洲大国始终存在通过“战略自主”维护本国利益的意愿。因此,此轮欧亚变局之后,欧洲格局变化的趋势将从一体化向多极化方向转变。刘作奎研究员指出,1975—2023年的近50年中,欧盟对华政策经历了三个标志性阶段:第一阶段是1975—2005年,欧洲和中国以互利共赢为基本出发点,强调相互依赖的重要性;第二阶段是2006—2018年,欧盟从坚持经贸合作对等互惠到开始关注中国给欧盟带来的竞争;第三阶段是2019年至今,欧盟对华政策进行三重定位,对华合作寻求“去风险化”。他认为,欧洲对华政策“去风险”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反映了欧洲在对待全球化、国际合作、国际秩序和安全等方面的态度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地缘政治和价值观优先日益成为欧盟对华政策的主要方向之一。段德敏副教授认为,欧洲在对俄罗斯的战略选择问题上存在明显的两派立场,大致可以勾勒出欧洲战略自主和战略依附的两种形态,这两种形态指向两种完全不同的对世界秩序的构想:一种是以国际法为准绳的世界多极

格局;另一种是美西方霸权的单极秩序。因此,中国在欧洲问题上的战略选择和政策制定需要动态地把握欧洲的定位,避免单一化、静止化。闫瑾副教授指出,德国女性主义外交政策旨在加强世界各地妇女、女童和其他边缘群体的权利,提高妇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代表性,以解决性别不平等,并改变阻碍性别平等的权力和结构,从而将性别平等纳入德国的外交和发展合作政策。然而,该政策对照国际社会现实具有乌托邦色彩,本身存在诸多缺陷,因此很有可能随着政府更迭,外交政策前缀的“女性主义”一词成为历史的尘埃。门镜教授指出,近年来,欧洲极右翼政党迅速崛起,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意大利兄弟党、瑞典民主党蓬勃发展。随着极右翼政党进入成员国政府,其在成员国和欧盟的影响力迅速增长,对成员国以及欧盟与中国关系产生巨大影响。

在闭幕发言中,戴炳然教授指出,我们对欧洲要有新的认识,在中欧关系方面要有新的思维。目前,双边关系呈现两个趋势:政治关系安全化和经济关系的政治化。安全问题已经超越地理距离,各个领域的龃龉都可以上升到安全层面;而作为“压舱石”的中欧经贸关系是否还能发挥重要作用,也值得深入思考。冯仲平研究员建议,应加强对欧洲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

的方法论探讨,厘清欧洲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之间的关系,并重视智库建设,将学术研究、基础研究、理论与政策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相结合,注重人才建设。于文杰教授对中国欧洲学会的支持、与会专家的精彩发言、会务组的辛苦付出表示感谢。他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牵动欧洲问题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学者们要努力将学术创新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为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本次会议不仅深入探讨了当前欧洲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领域的最新动向,而且就中欧关系的走向、俄乌冲突、美国“印太战略”等展开了内容多样的讨论,可谓是“学术盛宴”,与会者普遍反响热烈。与会的专家学者就中欧关系进行了多切面、多维度的论述,进一步充实了中欧关系研究的内涵,有助于中国欧洲研究学界在对欧交流中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阐述好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作者简介:胡孝佳,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迪丽阿热·安外尔,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齐天骄)